

東江水供水60年：飲水思源

水是極之珍貴的天然資源，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有不可或缺的角色，維持生命固然要水、經濟作業亦要用水。由於食水資源的地理分布極不平均，世界多處都面對清潔及安全食水供應不足的問題。香港市民很幸福，雖然地方小，卻不愁沒有水用，關鍵之一就是我們有東江水作為我們穩定的食水供應來源。

聞正聲 時事評論員

今年是東江水供水60周年。在過去一個甲子的時間，東江水源源不絕供水，緩解香港水資源極度短缺的問題。今天大家扭開水龍頭，食水就即時流出，年輕一代可能想像不到60多年前的1963年，香港曾出現嚴重旱情。當年為解決食水不足的問題，實施超過一年的制水措施，最嚴峻時每四日才供水一次，每次供水只有四小時，對經濟和民生有多大影響，可想而知。

東江水佔港淡水用量達八成

其後港英政府與廣東當局進行多番磋商，達成興建東深供水系統的共識，並由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批准，由中央人民政府撥款興建；香港則負責興建抽水站、水管和隧道，將東江水分送到香港各區。當年國家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國家困難的時期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推展有關工程，由1964年2月20日動工，大約一年時間就完成83公里長的供水工程，並在1965年3月1日起正式向香港供水；國家對香港的關愛，實在令人動容。

全球的水資源只有少於2.5%是淡水，其餘的都是海水。換句話說，假設用100隻杯盛載地球上所有水資源，淡水僅佔當中的兩杯半，再加上部分淡水資源藏於南北極未融化冰山，故此實際可供飲用的淡水資源其實僅佔地球總水量不足1%。

東江水，正是世上最難得的淡水資源之一，對香港的重要性，從它現時每年8.2億立方米的供水量，佔香港淡水總用量七至八成便可知曉。如沒有東江水，香港便必須另覓替代品去填補這七至八成淡水用水量的缺口；單靠貯存雨水根本不足以應付需求，而如靠海水淡化，則成本不菲。

東江水協議價格合理保足夠供應

現時特區政府與廣東省簽署的東江水供水協議中，已採用「統包扣減」方式，香港可按需要輸入東江水。舉例而言，如當本地雨水集水量較高，所需的東江水水量低於每年供水量預設上限時，水價會按實際供水量從基本水價扣減；相反，香港亦可根據實際需要，與粵方商討增加輸入的東江水量至11億立方米。

在最新一份購買東江水協議中，香港在2024-26年三年間的東江水基本水價約157.7億元。過去有評論指東江水「太貴」，甚至形容其價格有「謀取暴利」之嫌，但筆者認為有關說法不但站不住腳，更是抹殺廣東多年來對香港的照顧和協助。

首先，東江水供水協議內的水價，並不單單是「水」本身，亦包括保護輸港東江水水質措施，以及維護沿河基礎建設、系統運作及維修等的費用。根據發展局去年回覆立法會查詢時表示，近年輸港東江水的價格調整較側重人民幣兌港元匯率、粵港兩地物價指數的變化，而用於生態保護及其他方面的新增成本並沒有全面考慮在內。

翻查資料，向香港供水的輸水設施需要翻越高山，讓水「倒流」83公里後方能進入深圳水庫，這項工程由建設到日常保養的花費都十分巨大。此外，為保障輸港東江水水質，內地多年來實施多項大型基礎建設及生態環保措施，例如污水處理及調污的基礎設施，以及在沿東江流域進行截排，嚴格限制開發東江流域沿線保護區；遷走東江河道附近具污染性的工廠及土地復修等的生態環保措施。

以上種種措施，確保了輸港東江水的穩定性和水質符合用作平常飲用「地表水」的最高國家標準。由此可見，輸港東江水的安排，絕非只是普通的一門生意，更是國家戰略支持香港的重要措施。

「先節後增」珍惜水資源

根據專業國際研究機構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在202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約有40億人，即世界一半人口，每年至少有一個月處於「高度缺水」狀態。可想而知，穩定的食水供應並非理所當然的事。

氣候變化日益加劇，令香港降雨量不穩定，但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又勢必令用水需求上升。為應對這個挑戰，特區政府提出「先節後增」的原則，控制用水需求增長，並開拓新水源。在政府擴闊水資源的網絡體系、加強管理水管爆裂和滲漏以減少用水流失的同時，社會各界亦應減少和節約使用珍貴的水資源，大家都盡自己一分力，讓香港擁有一個「不缺水的未來」。

美國圍堵脫鈎政策 難阻中國與世界各國合作

嚴剛 立法會議員



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2024年GDP保持了5%的增長速度，預期今年仍將保持5%左右的增長速度，並持續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外貿總額連續跨過42、43兩個萬億級大關，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更加穩固。據商務部、外匯局統計，中國境內投資者對全球151個國家和地區的9,40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10,244.5億元人民幣，增長11.7%。事實證明，美國小院高牆的圍堵脫鈎政策，難以隔斷中國與全球經濟的密切聯繫，只會促使中國加快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強與全球各國的經貿關係。

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日前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期間表示，美國的政策難以阻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反而會促使中國加速與其他國家展開更為廣泛的經貿合作。

中國外貿總量增量品質齊升

海關總署統計顯示，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43.85萬億元，同比增長5%，規模創歷史新高，外貿總量、增量、品質實現了「三量」齊升。中國已經成為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外貿「朋友圈」越來越大。值得關切的是，2024年，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22.07萬億元，同比增長6.4%，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50%，顯示中國製造在新興市場的比重明顯增加。

中國持續佔據全球製造業的主導地位，去年中國全球貿易順差高逾7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去年的貿易順差遠超包括德國、日本或美國等出口大國在內的任何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曾經達到過的水平。以持續圍堵中國發展、打壓中國製造，加徵中國貨物關稅的美國為例，2024年全年，中美貿易總額為6,882.8億美元，同比增長3.7%。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5,246.56億美元，中國自美國進口1,636.24億美元。

巨大產能助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

以新質生產力為動力的源源不斷的新動能為外貿發展持續注入強勁動力。「中國製造」在全球市場廣受歡迎，依託的是配套完整、持續迭代升級的高技術含量的產業體系，靠的是

研發的持續投入和創新。中國堅定不移地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贏得了全球各國的歡迎與信賴。儘管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挑戰增多，但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力大的基本面沒有變。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仍將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是香港特區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堅強靠山。

薩克斯說得很客觀：「中國應該向國外銷售更多的電動汽車、更多的大太陽能設備、更多的高鐵、更多的5G技術，因為這些都是世界需要的技術，而中國擁有巨大的產能。這意味著中國有巨大的能力來增加出口。」一個簡單的事實，美國和歐洲加起來有8億人口，僅佔世界人口80億的十分之一。世界上還有90%的人口都需要中國的產品，希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希望加強與中國經貿合作。

美國長期以來不斷對中國實施打壓圍堵政策，實施科技霸凌，結果卻適得其反，最終是造成美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中美貿易總額及中美貿易順差持續穩步增加。一方面未能化解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另一方面反倒是促進了中國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完整的產業生態鏈的建立健全，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和DeepSeek橫空出世就是美國壓力反彈最好的證明。

隨着中國新質生產力驅動力社會經濟的穩步發展，中國更加需要寬鬆和諧的外部環境，在加速改革開放中，不斷擴大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貿往來。這恰恰就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香港的機遇所在。首先，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推動跨境資本流動與人民幣國際化，參與前海、河套等合作區發展，助力內地企業對接全球市場。其次，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高校的基礎科研優勢與深圳的產業化能力互補，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形成協同創新鏈。再次，香港法律、金融、財稅等專業服務通過CEPA服務貿易協議《修訂協議二》更深入參與內地市場，同時依託「一帶一路」節點優勢，拓展與全球各地的高附加價值經貿合作。最後，香港的金融科技與數據跨境流動試點，將有助於深化東西方市場規則的銜接與創新，確保香港能夠持續發揮基於「兩制」獨特優勢的「超級聯繫人」作用。

國際刑事法院淪為西方政治工具

何志平



近日，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在菲律賓機場被國際刑事法院（ICC）執法人員拘押至荷蘭海牙受審，不僅聚焦國際社會關注，還引發菲律賓民眾示威抗議。許多人對不清楚國際刑事法院是何機構？是否為聯合國下屬組織？又與國際法院（ICJ）、國際刑警組織（ICPO, Interpol）有何區別或關聯？國際刑事法院如何在菲律賓2019年正式退出之後，堅持指控杜特爾特任內涉嫌「反人類罪」而進行「跨國追責」？背後有何貓膩？

ICC與聯合國只有合作關係

國際刑事法院（ICC）是根據1998年簽署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設立的永久性獨立國際法庭，2002年7月開始在海牙運作，旨在對個人侵略罪、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及戰爭罪等嚴重罪行進行審判，主要職能僅在國家司法系統「不願或不能」有效追責時介入，遵循「輔助原則」，但不替代國家司法主權。

國際刑事法院並不隸屬於聯合國，與聯合國只有合作關係。截至2015年10月，全球134個國家簽署《規約》，最終獲123個國家批准生效，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美俄三國集體缺席（其中美國於2000年12月簽署《規約》，但在國會批准前取消；俄羅斯在2000年9月簽署後，俄議會一直未予以批准生效，2016年普京直接宣布退出）。

國際法院是聯合國六大主要機構之一，總部也在海牙，只據國際法處理國與國之間法律爭端，不受個人法律糾紛。

國際刑警組織是1923年由194個成員國成立的政府間組織，是各國警察機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平台，專注跨國警務合作，打擊跨國犯罪，不具備直接執法或起訴權。通過發布「紅色通報（Red Notice）」協助成員國追捕或引渡嫌疑人，並非逮捕令，僅為信息共享工具，不摻和政治糾紛，具體執行完全取決於國家自身意願，實際效力受制於其政治意願和法律程序。

國際刑事法院與國際刑警組織無從屬關係。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審判，需依賴國家或國際刑警組織協助逮捕嫌疑人。如本次杜特爾特事件，就是由國際刑警組織協助發出紅色通報令，菲律賓政府調動軍力直接配合執行。

欺軟怕硬執法雙標

國際刑事法院成立旨在於伸張正義、為世界懲奸除惡，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一直被詬病執法雙標，欺軟怕硬，「充當了戰爭挑動者的政治工具」。

首先，需理清國際刑事法院的執法標準。執行的是什麼法？誰家的法？為誰而執行？

國際刑事法院的主要職能是補充性管轄原則，受理案件只有在國家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實施管轄時，才能作為最後訴諸手段，對核心國際犯罪進行調查和起訴。這意味著按補充性管轄原則，國際刑事法院是國家司法系統的補充，其管轄權應建立在國家同意的基礎之上。

如同國家憲法與國內地方法律，憲法通常由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制定，是國家基礎性法律；地方法由其他具立法權機關或地方政府制定，是對憲法的補充和細化，不得與憲法基本原則相抵觸。國際刑事法院所管轄罪行具有特殊性，牽涉國家

司法主權，國家主權大於一切，國家不樂意，「地方法」又如何能越俎代庖、越位「憲法」？

其次，執法雙標。截至目前，國際刑事法院在23年間起訴的50宗案件中43宗針對非洲和亞洲國家，其中多位在任國家領導人遭到指控，卻對美英等西方國家戰爭罪行視而不見。非洲國家強烈不滿，非盟在2013年10月舉行特別峰會，討論國際刑事法院只判非洲人的問題。他們認為，非盟成員國元首在任期間都不應受到指控，也不應被要求出現在任何國際法庭。

2016年10月，布隆迪首先宣布退出《羅馬規約》。三天後，南非退群。隔日岡比亞也緊跟着退出，理由是國際刑事法院實行雙重標準，涉嫌「迫害和羞辱有色人羣，尤其是非洲人」，指出2002年以來，至少有30個西方國家曾對其他獨立主權國家和公民犯下了「令人髮指」的戰爭罪，但從未有一個戰爭罪犯被審判。國際刑事法院已成為「迫害和羞辱有色人羣的國際白人法院」。

2016年11月，俄羅斯對國際刑事法院相關「格俄衝突」調查強烈不滿，宣告退出且嚴重質疑其未能滿足國際社會期望，未成為一個獨立而有威信的國際司法機構，諷刺「正義的標準取決於被告護照的顏色」。2019年菲律賓政府不服其對杜特爾特的罪名指控，也退出。俄羅斯並非與南非、伊朗等十國聯署《反司法殖民宣言》，直指國際刑事法院已成「新殖民工具」。

ICC是西方強權政治的遮羞布

最後，欺軟怕硬，淪為政治工具。2020年底，國際刑事法院發布一報告稱，2003年英駐伊拉克士兵對至少7名在押伊拉克人犯下了包括蓄意謀殺等在內的戰爭罪。其首席大檢察官本蘇達說，我們進一步發現，多層面的民事監督和軍事指揮失誤，導致英士兵在伊拉克犯罪。但報告最後一頁卻宣布此案完結，原因是「英國已採取了真正的行動來調查這些罪行」，他們只在發現一國無法或不願對所指控罪行採取行動時才會干預。然而事實是十年過去，英國未曾指控一人。

2024年11月，中東局勢升級之際，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前國防部長加蘭特，以及哈馬斯軍事指揮官穆罕默德·迪亞卜·易卜拉欣·馬斯里發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反人類罪和戰爭罪」。不過，此舉很快引發了以色列的盟友美國的不滿。2025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威脅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制裁。

美國長期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對其及盟友的調查，反通過制裁強力施壓。這不禁讓人聯想到2023年，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及內塔尼亞胡的通報，前者被西方媒體奉為「正義出擊」，後者有加沙炮火中淪為廢紙。但不約而同的是，二人仍大搖大擺自由出入多國。就像被菲律賓現政府送上國際刑事法院審判台的杜特爾特，其律師在庭審中當眾甩出厚達500頁的轉賬憑證，指控案件檢察官與菲反對派存在秘密資金鏈，以及菲禁毒後犯罪率暴跌73%實況，並出示美軍屠殺35萬阿富汗平民、致死伊拉克25萬平民、以色列炸死5萬加沙兒童的大量圖片，質問「哪邊更像反人類」？這種「選擇性失明」，讓眾多國家集體覺醒，國際刑事法院「只打蚊子，不打老虎」，不過是西方強權政治的遮羞布！

緩解考生壓力 需重拾教育初心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培僑中學教師



香港中學文憑試開考在即，學友社最新調查揭示考生壓力指數持續攀升至6.9分。這個看似抽象的數字背後，是應屆考生無數個挑燈夜讀的身影，同時也是教育系統結構性矛盾的具象化呈現。當我們試圖緩解考生壓力時，不能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表面，而應直面香港教育制度中的癥結，也要重構教育本質對於學生、家長甚至教育工作者的深層認知。

人才培養簡化為標準化考試

以筆者十年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所見，公開考試壓力早已超越單純課業負擔，已演變為制度性焦慮的集體投射。現行教育體系將複雜的人才培養簡化為標準化考試的數字遊戲，全港近五萬名考生被強行納入同一套評價模組。考評局數據顯示，八大院校聯招學位低於考生人數，縱使現在一般考生的競爭相對筆者當年而言已經明顯降低，但這種稀缺性競爭依然迫使學生在有限的知識賽道上「內卷」。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考評制度改革，中文科取消口試、通識科轉型公民科等變動，在缺乏系統銜接的情況下演變為新的不確定源。

另一方面，學生、家長所接受的社會價值觀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焦慮。補習天王年入過千萬的神話、每年放榜後不同媒體對於「狀元」的熱捧，都在強化「一考定終身」的集體潛意識。這種扭曲的價值導向，使得考生被迫將自我價值與考試成績強行綁架，筆者認識的某band1中學心理輔導主任透露，其學校近年出現考生

因校內模擬考失利而自殘的極端案例，正正是這種異化教育的惡果。

教育評價體系需根本性變革

破解考生壓力困局，需要教育評價體系的根本性變革。芬蘭教育改革的啟示值得香港借鑒，比如建立多元評價體系，將課程研習報告、專題研究成果等過程性評價納入升學考量。現時文憑試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校內評核報告作為最終成績，但其比例依然偏低，中文作為文憑試的「死亡之卷」，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分數出自校本評核。不少教育研究都表明當學生擺脫應試框架展現真實能力時，其創造力遠超傳統筆試的測量範疇。這種改革不僅需要考評技術的革新，更需要整個社會破除對標準化考試的迷信。

另外，考生的自我認知重構是舒緩壓力的關鍵內因。心理學中的「成長型思維」理論指出，當學生將挑戰視為成長契機而非生存威脅時，抗壓能力會顯著提升。筆者所在的培僑中學中五級曾為學生舉行「失敗工作坊」，由教師向學生分享自己失敗的經驗，比如是模擬面試失敗、公開演講失誤等場景，以此幫助學生建立彈性心態。這種訓練不是逃避壓力，而是培養與壓力共處的智慧。

教育改革的深層命題，是如何在後工業化時代中找到「標準化評價」與「人性化成長」之間的平衡點。站在文憑試改革的十字路口，我們需要的不是更精巧的應試策略，而是重拾對教育的初心。壓力管理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關乎我們要締造怎樣的下一代的價值抉擇。解構文憑試壓力困局的過程，正是香港教育重獲新生的契機。